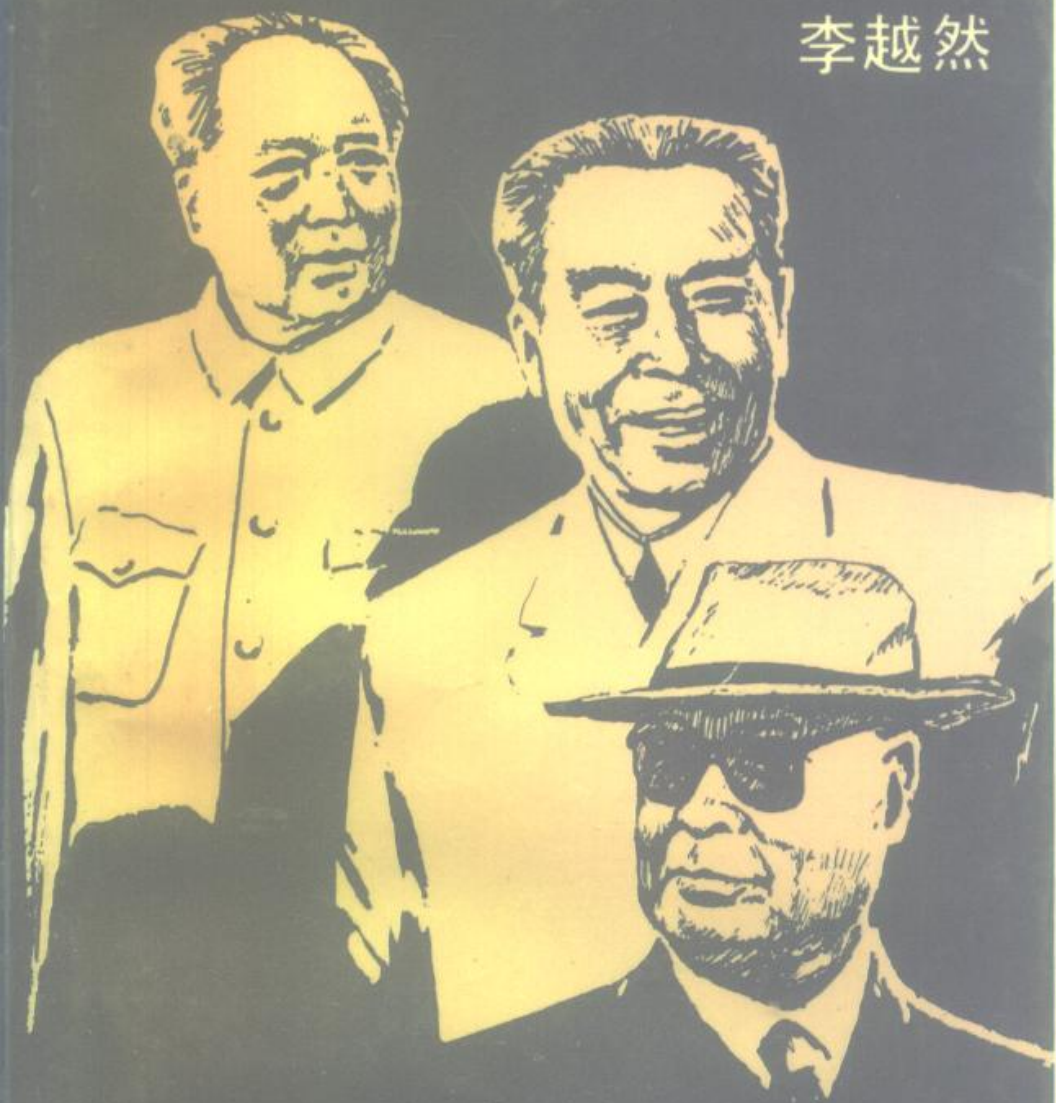


李越然



外交舞台上的

新中国领袖

解放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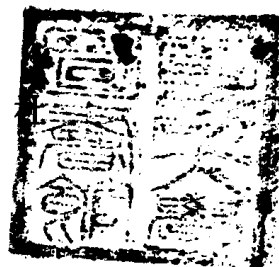


2 017 7890 5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李越然回忆 权延赤整理

解放军出版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李越然回忆

权延赤整理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发行

十月图文信息工程部激光照排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6开本 7.5 印张 4 插页 136 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 — 22000 册

ISBN 7-5065-1230-0/I·173

定 价: 2.95元

社编号 04—0040



195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

目 录

[1]	前言
[3]	刘少奇从苏联接来高级顾问团
[22]	陈云对苏联专家说：物价问题， “波一波也不行”
[45]	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西方
[61]	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的微笑与 杜勒斯的冷面孔
[81]	薄一波参加全苏工业会议

- [95] 苏共“20大”后，彭真率人大代表
团出访苏欧
- [110] 周恩来出访苏联、波兰、匈牙利
- [125] 苏联元帅向中国士兵敬礼
——伏罗希洛夫的中国之行
- [136] 1957：毛泽东访问苏联
- [149]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 [166] 赫鲁晓夫两次匆匆来华
- [184] 26 国共产党工人党起草委员会
中苏两党公开冲突
- [198] 论战与妥协的产物——《莫斯科
声明》
- [214] 陈毅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 [229] 中苏末轮会谈
赫鲁晓夫时代结束

前 言

：

1949年至1964年，在这15年的时间里，我在俄文翻译或秘书工作的岗位上有幸多次随同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中苏之间的一部分重要会谈，以及国内外的某些重大国际活动。

岁月流逝，春秋交替，几十年已经过去。当年，大家称我为小李，现在我已经年过花甲。仅仅根据个人的记忆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情景写下来，作为零散的史料奉献给读者。这本书只是初步的回忆录，以中苏双边的事为主线，也涉及某些多边的国际活动，素材和整体内容还都是粗线条的。

而今，中苏关系和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5月中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等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高级

会晤，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广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大事，我们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中苏关系从友好到重大曲折再到友好，这种“马鞍形”的格局是在各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回忆过去，不论涉及哪一个时期的情景，都不是要用几十年前的老眼光来观察和理解当代的新事物。邓小平同志说：中苏关系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国和苏联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近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并相互交流和借鉴改革事业的经验，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当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领袖人物许多位已经过世了，有的还健在。我所接触过的事情只是一幅庞大的历史画卷中的某些局部，况且一个人的记忆又是有限的。书中提供的素材和叙述，难免不尽完整，深望得到当年同我一起共事的同志们的指正。

李越然

1989年10月5日于北京

刘少奇从苏联 接来高级顾问团

解放战争初期，在哈尔滨，我和大批进步青年一起投身到革命洪炉。在接受党史教育的时候，常有一些老干部向我们讲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我们党的领袖们的事迹，作为一个青年，我一直幻想能有机会见到这些人物，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1949年8月上旬，东北局外事处处长卢竞如拿着东北局的调令找沈阳铁路局局长黄锋同志，调我到东北局参加工作。调令上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签名。

那时，我在沈阳铁路局局长办公室任翻译科长兼铁路局中苏友协秘书。不久，我参加接待随刘少奇第一批来华的苏联顾问团。卢竞如同志介绍说：刘少

奇受中共中央委派，7月份到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寻求援助。斯大林派来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团长，有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这次的接待任务非常重要，你在苏联学习过，又长期搞俄文翻译，所以组织上决定调你参加这次接待任务，担任翻译。

我父亲就是一个老俄文翻译，我自幼生活在较好的俄语语言环境中，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又在苏联学习，使俄语水平得到提高。所以对翻译工作是有信心的。但是想到这次的服务对象都是从未接触过的高级领导人物，便又不免紧张，深感担子沉重。

毕竟年轻，不乏血性和锐气，更多的还是感到光荣和激动。我用力点点头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完成好任务。”

那天，从沈阳火车站到和平街1号的东北局专家招待处，沿途基本净街。这种戒备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必要的。因为同国民党的战争在南方和西北仍在继续，东北虽然解放了，残余的土匪、特务仍然活动频繁，所以警卫工作不能不高度严谨。

在月台上，我首先见到了高岗和李富春。他们当时都正当盛年，这种公开场合，给我这样的小青年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庄严、稳重。偶尔交谈两句，看看腕上的表，又向火车进站的方向探望。

专列徐徐驶入车站，在制动声中缓缓停靠在月

台旁。欢迎的群众场面不大，但很隆重，人群中的妇女手持鲜花，几百人热烈鼓掌。车门打开，刘少奇、科瓦廖夫和一直陪同少奇同志出访归来的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等同志一边向欢迎人群招手，一边走下车厢。高岗、李富春首先迎上去，握手问候。

刘少奇穿一身米黄色中山装，面带微笑，显得文静慈祥，不时鼓鼓掌，又招招手。他话不多，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家的风度。同高岗略一握手，便将身子侧开，伸出手臂请科瓦廖夫上前。

高岗感情比较外露，话也多，上前两步与科瓦廖夫拥抱，互相说了许多热情的话。

一年前还在哈尔滨的时候，我同高岗接触过。他身材高大，背地里有人悄悄叫他“高大麻子”。其实，他肤色很白，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满脸黑麻坑，而是浅白麻子，离远点是看不出来的。他梳着很精神的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眼睛不大却目光闪烁。他戴一副近视镜，喜欢从镜框上面闪出两道深沉的目光审视下级，使人一望不能不生出紧张和莫名的疑惧。

他那一身粗大骨骼再配上颇显粗犷高亢的陕北腔，讲起话来颇有点威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聊起来，常说 he 敢决敢断，听下级汇报很少讲“研究研究再说”，喜欢当即“拍板”，或者马上抓起电话命令有关人员去办理。在建设东北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做出过一些成绩，受过毛主席表

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并且曾集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于一身，他曾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重要人物。

但是，他也是个“玩家”。他特别喜欢跳舞，每当到了舞场，便会解去浑身的“甲冑”变得异常活跃，总是往女人堆儿里扎。他善于向女人调情也敢于调情，目光象猎手一样瞄来扫去。尽管消息控制严密，但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仍不时传出。特别是有些女人事后是要钱的，那时干部实行薪金包干制，他的钱只能向后勤管理部门要，这种事想包也包不住……

他又讲究吃，不象我后来接触的其他领袖人物，饮食随意简朴。我的印象中，他挺喜欢西餐和奶制品，嚼起奶酪来总是津津有味。他还喜欢穿苏式的肥腿裤。当年的某些苏联领导人比较欣赏高岗。斯大林自不必说，就是高岗垮台后，我还曾两次听到赫鲁晓夫讲“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高岗后来终于滑到妄图分裂党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又不思悔改，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的地步，这与他生活上的腐化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结果。这种人不可能不搞小动作。历史证明有个人野心的人总是喜欢搞小动作。

记得 1953 年 5 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捷沃西安来北京，在东交民巷8号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的三大工程建设，谈判后一道去鞍钢参加三大工程——高炉、平炉、轧钢车间的开工典礼。在火车专列的会客室里，高岗与捷沃西安交谈时，由我担任翻译，双方有一段对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高岗俯过身去，皱着眉头小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望着高岗，毫不迟疑地宣称：“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点点头，然后用抱怨的语气说：“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捷沃西安说：“是吗？是怎么一回事儿？”

于是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捷沃西安说：“好，我回去一定报告。”

后来得知高岗反刘少奇，想取而代之。他向苏联领导人倾吐的不满，反映出他早已别有用心。他还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诬蔑其他领导同志。这些活动被揭露后，仍然坚持错误，终于畏罪开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不过，在1949年8月的时候，他还不曾滑得那么远。那时人们还都喊他“高主席”。因为他确是东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也因为他确实喜欢听人喊他“高主席”。

刘少奇及其随同和苏联高级顾问团一行人，在车站休息室稍事休息，便分乘几十辆胜利牌小轿

车，浩浩荡荡驶向东北局专家招待处。

东北局召开干部大会欢迎少奇同志和苏联专家。

会场设在东北局专家招待处的大礼堂。我做大会翻译。记得主席台上坐了刘少奇、高岗、李富春、师哲、科瓦廖夫等主要领导同志。

高岗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强调苏联援助对东北地区的特殊意义。记得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正面临全面的胜利。特别是我们东北，在苏联红军的直接援助下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东北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恢复和发展建设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援，东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讲到这里，高岗的目光射向科瓦廖夫同志，提高声音说：“现在，斯大林又给我们派来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高级顾问团。我代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向苏联党和人民，向伟大的斯大林，向亲爱的顾问团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敬意！”高岗的精神头上来了，一口气讲了十来分钟不停。总算还想到了要翻译，他看看我问道：“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我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讲话，脑子里已经组成译案，所以就回答说：“请放心，我都记住了……”

科瓦廖夫代表全体苏联专家讲话。据说他在卫

国战争时还是位将官级指挥员。他把娴熟的俄语和丰富的面部表情结合起来，再配以生动的手势，熟练地表现出各种感情色彩。他时而神往地凝视远方回顾中苏友谊的历史和传统，时而又热烈地欢呼这种斗争中形成的友谊得以发扬光大；他忽而肃然起敬地立正身体，庄严宣布顾问团来中国是斯大林亲自做出的决定，并且是挑选了最优秀的专家，接着又象前线指挥官发布动员令一样要求苏联专家们要全力工作，毫无保留地把经验贡献给中国同志。最后，他热情洋溢地向东北局的同志表示感谢，感谢对顾问团一行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与会者对科瓦廖夫神采飞扬、感情澎湃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继他之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讲了话。

刘少奇的讲话与科瓦廖夫形成鲜明对照。他庄重平静又不失幽默，声音不高不低，象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既有政治家的深思远虑，又带了哲学家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因为是欢迎苏联顾问团，他回顾了中国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得到的苏联的援助。谈到中国革命面临全面胜利，面临要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又回顾了这次莫斯科之行同期大林的会见，表达了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慷慨援助的感谢之情。他向苏联顾问团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礼，说：“苏联专家远道而来，他们把家属放在家里，把本身的工作也放下不顾，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

作很好的老师。”

说到这里，刘少奇明锐的目光扫视一遍会场，告诫中国同志：“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少奇同志的讲话引来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现场动人的情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给予的高度重视；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把大家融接在一起。中国方面对自己的同志确实是象少奇同志指示的那样，要求是很严格的。例如，东北铁道兵团副司令员黄逸峰在与某些苏联专家的合作中有缺点，不仅受到批评，而且在科瓦廖夫到了北京之后，黄副司令员还特地约见他当面作自我批评。这件事是由我联系的，翻译也是我。科瓦廖夫在东北时就与黄副司令打过交道。我本以为他会出于礼貌而婉拒中国的将领找他作检讨。但事情不是这样，他在讲话中口气颇有些上司的味道，话语中甚至把事情提到了“有反苏情绪”的高度。当时黄逸峰是从天津乘压道车赶来北京见他的，心里本来就有些不顺，一听到什么“反苏”，这位副司令就不买帐了，他向科瓦廖夫说：“在工作中，我对苏联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够，这样对合作不利，也应该自我批评，注意纠正，但说什么‘反苏’，岂非无稽之谈？”接着激动地说：“我对苏联是了解的，有感情的。我在学生时代就是向